

程文超◎著

一九〇三：

前夜的涌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程文超文存 2

一九〇三：前夜的涌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小 引

1903 年是平凡的一年。晚清如一张老化的旧唱片，虽已五音不全，唱针却还在上面划着那最后的几圈沟纹。

这一年的旧历元宵，黄山脚下某个山间小路上，一个小孩儿给大姊拜完年后正随亲人往家赶。路过三门亭庙，小孩儿一时兴起，要捣毁庙里的泥塑菩萨，同行入极力劝阻。小孩儿不听，虽未能推倒菩萨，却抓起石头狠狠地向神像砸了去。

他是胡适，未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旧文化的偶像终于被他和他的战友们推倒了。但 1903 年时，他才 12 岁，只能在神像面前耍点小孩子的顽皮。

时光还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还在历史的通道上赶路，他们出场的时间还未到。连鲁迅，此时也只在日本读书，间或做一点儿翻译。

此时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另外的人物。这一年，离戊戌变法那场风暴已有四年多，离辛亥革命那场风暴还有八年。古老的帝国，像处于两次风暴之间的大海，表面是平静的。但海底里，却汹涌着两场风暴所具有的各种激流。他们共同描画着“五四”前夜的一幅中国图。

本书的视野没有局限在文学，而是希望能同时看到文学舞台后面的背景和周围的氛围。

这是一个太大的舞台，本书只能从中抽出几个人物、几个场景以窥豹斑。

即便如此也令我震惊。

我震惊于20世纪初的丰富。整个20世纪的各种画面，都能从世纪初的几年里找到它最早的笔墨。

我看到，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并不是从“五四”才开始的。它于世纪之交就开始孕育。而在孕育期的文学与文化状态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第一，在现代性的内部，在其被孕育的同时，已经生长出与其对话的力量。第二，在现代性的外部，已出现反抗现代性的声音。

这便是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性追求。这里，“20世纪初”与“中国”两个字眼特别重要。作为在世界文化纵横大格局中的时间方位和空间方位，它们决定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正是在这样的方位上，20世纪初的文学打开了一片异常五彩缤纷的文化天空。它所具有的研究价值，特别是对今天和今后的意义，还远远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震惊于中国文化选择与建构的艰难。在20世纪初仁人志士们的英名和成就背后，我看到了他们的奋斗与挣扎，我看到了他们的苦恼与辛酸，我看到了他们心中的血与泪。中国人，有的是聪明才智，有的是拼搏精神，但中国的问题太过复杂。

我写了他们。我在对他们进行各种评价时，只是着眼于揭示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要对他们说长道短。因为，我始终对他们怀着敬意。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目 录

小引	(1)
第一章 梁启超：落伍者的超前追问	(1)
一 回到那次“跨出”	(3)
二 眼界一变又一变之后	(13)
三 梁启超与“五四”	(28)
第二章 章太炎：真俗之间的道德情怀	(51)
一 “革命”与“学问”	(52)
二 道德与秩序	(64)
三 过程与终极	(75)
第三章 苏曼殊：面对人生的苦难与诱惑	(84)
一 《惨世界》的“乱添乱造”	(85)
二 走向“潭影疏钟”	(92)
三 两种诱惑之间	(101)
四 “剪裁”的尴尬	(116)
第四章 王国维：20 世纪的另一思想源头	(122)
一 把“玉”叙述为“欲”之后	(122)
二 现代性与人生问题	(130)
三 “人间”的文学话语	(143)

四	发人深思的误读·····	(154)
第五章	谴责小说:“破船”叙述中的未来想象·····	(165)
一	欲海行舟 兴亡一梦·····	(166)
二	“游”者的视线内外·····	(174)
三	还彩云以“生命”·····	(186)
第六章	鸳鸯蝴蝶:被放逐的市民情调·····	(198)
一	不讨好的双重疏离·····	(198)
二	“逃避现实”与迎向现实·····	(213)
三	文人与大众·····	(222)
四	都市与乡村·····	(229)
年表	·····	(234)
大事年表(1902—1914)	·····	(241)
参考文献	·····	(249)
后记	·····	(254)
附录一	梁启超与“五四”·····	(257)
附录二	难忘梁启超·····	(273)
附录三	“两个西方”与“本土化”问题·····	(276)

第一章

梁启超：落伍者的超前追问

1903年2月20日。日本。横滨的轮船码头与横滨的街道一样，并没有显出与平日特别的异样。站在趸船上，再往前跨一步，便是那艘远洋客轮了。

梁启超跨了过去。

这一步，他跨得很不轻松。

可以说，从脚的跨出到落下，时光逝去了三年多。

三年多之前，他便迈出了去往美洲新大陆的步骤。那是1899年底，旧金山中国维新会成立，应该会同志邀请，梁启超离开日本，准备经由檀香山去往美国大陆。尽管这次出游的原因里另有微妙，但梁启超希望到美国考察之心实在是早已有之。因而那次行程仍然给梁启超带来兴奋。1899年12月20日，梁启超乘坐香港丸号向檀香山进发。那时的梁启超，二十几岁，生命和才华都正如大海的波涛，豪气冲天。船行海中，他觉得自己时在时空上正处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乃“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于是胸中万千块垒突起，斗酒倾尽、荡气回肠，挥笔写下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歌中以颇为不凡的口气写道：“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

国，问政求学观其光。”^①表达了自己去美国观光的宏愿和目的，从中可以见出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在渴望和拥抱着未来的美国大陆之行！

可惜那一次他并没有如愿。正遇淋巴腺鼠疫威胁着檀香山的神经，有关当局规定过往乘客不得登陆。梁启超不管不顾地登陆了，却因为实行强行检疫不能按期离岸。梁启超意外地在檀香山停留了半年。本想再去美国大陆，国内形势却发生急变。唐才常的汉口起义枪声即响，梁启超于7月密回上海。迎接梁启超的是起义失败和赴美大陆计划的搁置。梁启超去往美国大陆的脚步提起了，却并没有跨出。这一“跨出”直到三年多之后才完成。

这一“跨出”的并不轻松还远不在于时间意义，更在于其生命的意义上。这一步，标志着梁启超生命史上的又一次转折。这一转折非同小可。转折完成之后的梁启超虽然在政治、文化舞台上不断扮演过角色，但作为中国舆论界之执牛耳者，其“言论界之骄子”的地位已逐渐丧失，其在思想界那种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已不复再来了。在当时的革命派眼中，曾是“同志”和朋友的梁启超落伍了。更不用说在以后的“五四”时期，梁启超只能代表过去的时代。革命派至少还把梁启超当作论敌，而在新青年那儿，梁启超连作论敌的荣幸都基本上失去了。

这似乎是一个谜。一位差不多成为革命派“同志”的人，在去另一个世界“问政求学”之后，怎么竟会变成一个“革命”思想上的落伍者。

更意味深长的是，梁启超与他的那次“跨出”，并没有真的消失。梁启超是这样一个人：在历史车轮前进时，他是一个被抛弃的落伍者。他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但是，他之“落伍”，却并不像人们曾经否定的那样轻飘，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题时的思维方式都远

^①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远超越了他的否定者。多少年之后，当他又成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时，人们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他所提问题的“问题性”。

西方学者较早发现了梁启超的研究价值。美国学者勒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先后出版，成为汉学史上重要的学术著作。而中国学者对梁启超的兴趣再起则是因为世纪之交的触发：当又一个世纪之交来临时，人们发现，梁启超当年所提的问题，连同他发问时所用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再次凸现在了历史的天幕上。

这种“凸现”又迫使我们思考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多少年来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单向度描述，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世纪初的一些历史人物，比如梁启超，一个世纪之交的重要思想家，一个当之无愧的“天才”，为什么在历史变革面前会变得“保守”？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多向度和深刻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人物的艰难。被曲解了的历史简化了我们的思维、弱化了我们的智力。

重新理解梁启超对我们今天从简单进化论式的、单向度的、浅表的历史观中走出来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正面临着复杂的历史思考和历史性选择。

一 回到那次“跨出”

让我们先回到那次“跨出”。

梁启超实际上是带着复杂的心情跨上那艘远洋客轮的。

在此之前，只说1902年梁启超就相继创办了《新民丛报》《新小说》，倡导了“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给文界、思想界带来了一系列爆炸性影响。

而这些事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新文体”实践。这一

实践在1902年达到了顶峰。他用令人耳目一新、痛快淋漓的言说方式震惊着文坛、摇撼着思想界。梁启超自己对这一“发挥”也不无得意。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说自己为文“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精炼”。唐才常汉口举事失败后，他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专以宣传为业”时，为文“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① 这里大致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文体的追求与特色。

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将梁启超的新文体放在当年一班青年文豪的比较中来评价。他谈到谭嗣同、章炳麟、严复、林纾、陈三立、马其昶、章士钊等人，说他们“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冽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各有芬芳冷艳”。而他们的文笔和影响，都不能与梁启超相比：

至于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撼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②

饮誉文坛的黄遵宪则这样评价梁启超的文字：它“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③。

汪洋恣睢、惊心动魄的文字源于梁启超汪洋恣睢、惊心动魄的思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见《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吴其昌：《梁启超》，转引自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想。翻翻他 1902 年的文字，其范围之广、视野之阔、论述之博，几乎叫人难以置信。其笔触深入到中外文、史、哲、宗教、政治、经济、学术等诸多方面。然而在广博的关注里，有梁启超特别重视的地方。在洋洋数十万言里，有一个使用频率极高、极有冲击力的字眼：群。“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论合群”……^①

让我们先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谈起。这是近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论之一，是“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今天读来，你不难发现，这是一篇充满激情、论述却并不严密的文字。你看：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缱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偏社会，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②

小说何来此等罪恶？真如此，岂不该碎尸万段？

然而，正是这样惊世骇俗的论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原来，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此四种力，“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二、六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之十，见《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而“人类之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①于是，小说远不是传统所谓的“小道”、不登大雅之堂之“末技”，小说属于文学之最上乘，因它最“易感人”而最易“易人”。^②

文论家、文学史家都高度评价梁启超对小说价值的提升，它对促进近代以来小说创作的繁荣起了巨大的作用。这都无可否认。然而必须同时看到，梁启超并不只是一位文论家。可以说，“提升”小说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其手段。他看中的是小说之“力”，小说那“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小说在这里，是中国传统意象中的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小说之力，既能毁“群”亦能兴“群”；既能“腐败”群治，亦能“改良”群治。因而文章开宗明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结尾再作强调：“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里，目的与手段十分明确，梁启超真正重视的是群、群治。

那么，什么是“群”的所指，梁启超为何如此重视“群”？

早在1896年，梁启超便从其师康有为那里接过了“群”这个术语。“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也。”^③然而当时的“群”还是一个概念含混的术语，它是隐约包含着“国群”的“天下群”，源自康有为的“大同”理想。^④

到了1902年前后，在梁启超那儿，“群”已经明确成为了一个西方概念的中国化术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为了确立这样一个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之十，见《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同上。

③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文集》之二，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 同上。

“群”的概念，他在《新民说》中对以前“世界主义”的、“天下”的“群”作了廓清。他批评人们“动言天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他写道：“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他感叹“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

他认为：“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所磅礴冲击而成。”梁启超显然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民族”、“国家”两个词。而为了表示他的“民族主义”源于西人之观点，他特意加上了一个英文词。

那么民族主义是什么？“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学习西方“民族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改变中国。他强调：“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救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新民说》论述广泛，但其根本，是为实行民族主义。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梁启超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义务思想、论尚武……梁启超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梁启超崇尚“力”。他认为：“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知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①

这是梁启超学习西方，取“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以救民族国家的重要理论尝试，是一次强烈的呐喊。在梁启超，改变祖国民族的现状、救国是第一位的工作。他甚至不否认自己对革命的同情，“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②

^①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见《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同上。

只要能救中国，什么手段能成功都行。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公开打出了“反对现政府”的旗号。他确实充分树立了他“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①的伟岸形象。

然而，即使在其形象最伟岸的时期，梁启超也不是某一立场的坚定守卫者。首先，在文化立场上，无论多么强烈地主张学习西方，梁启超从没有准备丢掉传统。在论新民时，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因而尽管他认为，中国传统伦理过于偏重私德而缺失公德，但他在大论公德的同时，不忘论述“私德”的重要性。“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因为“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他主张破坏，却不主张“动曰一切破坏”。^②

其次，与此相联系，在政治立场上，如何破坏？革命还是改良？他正处于矛盾之中。这既与康有为有关，也与他自己的思考有关。后来，他在回忆这时的情形时说：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嫌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③

这种“交战于胸中”的“矛盾”，在梁启超应该是早已孕育。百

① 吴其昌：《梁启超》，转引自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见《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见《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日维新前的1897年，应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等人邀请，梁启超赴湖南时务学堂任主讲席。当时梁启超正是康有为改良阵营里的重要成员，但他的讲授已经十分激进。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他的讲授中“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掎击无完肤”^①。尽管梁启超这里所讲的“革命”，并不能与后来的革命派之“革命”相等同，但梁启超当时的大胆的“进取性”却是鲜明的。当时的一帮学生在梁启超的带领下，大多热血澎湃、思想激进。据梁启超回忆说，当时的四十几位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进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②。梁启超的讲学与颇有影响的“湖南改革运动”关系密切。

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联系颇多。起初由于康有为的态度，梁与革命派没有建立合作关系。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革命派来往密切。他与孙中山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谈，并事实上已经计划将改良派与革命派合并为一个由孙中山与梁启超共同领导的统一党派。革命成功后，将由孙中山出任总统、梁启超出任副总统。但这一计划被人告密。康有为知道这事后，极为恼怒，他命令梁启超甩开孙中山，立即离开日本赴檀香山，在海外华人中从事保皇会的活动。

这就是本章开头所提到的1899年底梁启超“另有微妙”的檀香山之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梁启超仍然在赴檀香山途中倡导了文学史上著名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尽管这里的“革命”并不直接言及政治，但梁启超不用“诗界改良”、“文界改良”，亦可见出梁当时对“革命”一词的喜爱。

檀香山之行，中止了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合作。自此之后，康有为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见《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同上。

对梁的压力不断增大，梁的思想尽管仍然激烈，但其思想深处一直胶着着革命与改良的矛盾。

当然，如果以为梁的“矛盾”仅仅因为康有为的态度，那又错了。康的态度只是外因。梁的矛盾更源于个人内心深处。

这种内心深处的“矛盾”，在他1902年发表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有着有趣的表现。

作为文学作品，《新中国未来记》远非上乘之作。但如果把它作为1902的梁启超内心世界的外在显现，那么，《新中国未来记》则是一个极佳的文本。它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价值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他那些当时产生极大轰动的精彩政论。

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在写作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这部书：

似说部非说部，似樵史非樵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自顾良自失笑。……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饯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赏之。^①

梁启超本来就没有想把小说写得何等的不朽，只给有心者提供“他种”“滋味”。这滋味，品出来了，自有其乐趣与深意在。而“似说部非说部，似樵史非樵史，似论者著非论著”恰恰是这部小说的叙述特色，其“滋味”全在这叙述特色里。

小说写“未来时”里的历史回忆。说的是距1902年60年后的1962年，南京举行维新60周年大庆典。各国全权大臣齐集南京，诸友邦还“特派兵舰来庆贺”，“好不热闹”。与此相应，上海则开设大博览会。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则在博览会场中央占了一个大大讲座，公举博士三十余人分类讲史。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

^①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孔觉民老先生应邀讲演“中国近六十年史”，正是1902年到1962年的历史。在这60年历史中，孔老先生重点讲述了创建共和国的“英雄豪杰”黄克强与他的好朋友李去病在留学归国途中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是小说的主干。

这是一部在“说部”里嵌“樵史”、在“樵史”里含“论著”的文本。说部里嵌樵史，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然而，不像《三国演义》一样将樵史演义成有声有色的故事，《新中国未来记》却在樵史的框架里安排“论著”。这种非驴非马的安排里有着梁启超的苦心。

梁启超说，他写《新中国未来记》“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①。然而，写政论性散文是梁启超之所长，其文笔之冲击力与魅力尽人皆知。既为发表政见，何必要托小说的形式呢？

小说为梁启超的奔腾千里的情感发泄提供了最好的形式。梁启超写政论也是笔锋常带感情的。但政论总以“论”为目的，情感的宣泄终有限度。积郁在梁启超心中的强烈情感是政论体无法满足的。他需要小说。

在《新中国未来记》里，梁启超借小说人物之口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骂了个痛快淋漓。

不少人认为，作为改良派的重要人物，梁启超与皇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清王朝寄托着希望。小说比其他任何文体都更为鲜明地揭示了梁启超的内心，写出了梁启超的痛恨，使他得以发泄一腔愤怒。通过人物游览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谈，作品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面，有力地揭露了清朝的“洋人小朝廷”，将作者对祖国的深重忧患抒发得淋漓尽致。

既然对这个朝廷、这个社会、这种现状如此痛恨，来一场痛快的革命使它彻底改变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不，情感并不能代替理智。目的当然是“改变”，但用什么方式

^①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